

你脑子里装着问题了,想解决问题了,想把问题解决好了,就会去学习,就会自觉去学习。要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 学问思辨行

文慕赫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语出《中庸》第二十章。紧接着这句话,还有以下这段十分重要的阐释: 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这句话,虽然仅仅只有十五个字,却精到论述了一个人该如何学习,这是古人赠予我们的永不过时的学习方法论。

我们都知道孟母三迁的故事,其实还有一个孟母断织的故事。孟母不满意孟子对学习的敷衍态度,对他说: 子之废学,若我断斯织也。经过此事后,孟子 旦夕勤学不息,师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如果说孟母三迁讲的是外因对一个人学习效果的影响,那么孟母断织则是从内因入手,强调个人持之以恒的努力是获得优异的学习效果的根本。

学贵有恒,最忌半途而废。《中庸》认为要么不学,一旦学习,不学到解决自己的疑惑就不能放弃;要么不问,一旦发问,不问到廓清自己的思路就不能放弃;要么不思,一旦思考,不想到让自己有所收获就不能放弃;要么不辨,一旦分辨,不辨到自己明白透彻就不能放弃;要么不行,一旦践行,不行到坚定笃实的地步就不能放弃。别人一次能做到的,我可以付出百倍的努力,别人十次能做到的,我可以付出千倍的努力。如果真能这样持之以恒做下去,即便天资愚笨的人也能变得聪慧,本性柔弱的人也能变得强韧。

学问思辨行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过程,宋代著名理学家程颢说: 五者废其一,非学也。漏掉学问思辨行中的任一环节,都将严重影响学习品质,甚而获得错误的知识而不自知。例如学与思两者是不可偏废的,孔子早在《论语·为政》中已经指出: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学不思,因为吸收太多书本知识,不去分辨书上的说法何者为真的根本,而迷惑无所适。只思不

学,容易流于空想,不考虑他人与前人的生活经验,则无论花费多少精力打磨出多么精妙的构想,也终究是于现实无补的。又如,我们身处的时代,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当信息呈几何级数生产出来时,若完全沿袭传统的学习方式,是无法有效应对错综复杂、日新月异的社会变迁的。这就要求我们把 问 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求我们必须有更加清晰、更加准确的问题意识。问题问得好、问得准,抓住了事情的关键,就找到了学习的方向与重点,就能对成功解决问题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学问思辨行,落脚在一个 行字上。古人认为知与行这两者同样是不可偏废的,在这方面,古人留下了各具匠心的丰富论述。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说过: 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与此同时,朱熹还认为知与行,就其轻重而言,当以力行为重。到了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这里,他提出了 知行合一 的理论,他不同意朱熹知行先行的观点,而是

认为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行是同一个过程,不分先后。王阳明还认为知而未行,等于未知,也强调了行的意义与价值。

古人关于学习的很多论述,都是以道德知识为学习对象的。如朱熹在诠释学问思辨行时就讲: 学、问、思、辨,所以择善而求知,学而知也。笃行,所以固执而为仁,利而行也。这其中蕴含的智慧,部分适用于其他知识的学习,即使对今天我们如何学习也有启发的价值。

在风起云涌、各种思潮相互激荡的二十世纪,中国人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在1937年写下了被称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最核心的文本《实践论》。这篇文章认为: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现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高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

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仍然使用知与行这两个词,但它们的意义不再局限于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而是有了更普遍更广泛的意义。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科学论证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应当认真坚持的学习方法论。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是伟大的,也是艰巨繁重的。肩负党的各项工作的广大党员干部,是一刻也不能放松学习的。既要学与本职工作有关的专业知识,也要尽可能多地学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知识,更要经常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现阶段要集中精力学习党章党规与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学习的目的在于提高自己的党性与解决民众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的能力。只有党性坚定、留下经得起检验的实绩的共产党员,才称得上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王子君

## 和 与 文化

和 是中国社会的主题字,是一个美好的字,是家和、国和、世界大和、天地人和

和、和谐之义。

和 的音乐美学思想的渊源可追溯到远古时代的礼仪祭祀活动。在《尚书·尧典》有一段话记述了这种原始礼仪活动的盛况: 帝曰: 夔, 命汝典乐, 教胥子, 直而温, 宽而栗, 刚而无虐, 简而不傲, 诗言志, 歌咏言, 声依咏, 律和声, 八音克谐, 无相夺伦, 神人以和。夔曰: 于, 予击石拊石, 百兽率舞。从中我们不难解读到,在原始的仪式中,礼、文、乐三者构成了仪式基本的要素。礼是仪式的主体内容,文为行礼之人,乐是仪式的灵魂。人按照音乐的节奏完成仪式的内容,通过对文、乐、歌、声、律的吟咏或唱和及对八种乐器协调有序的演奏,达到与祭祀对象 天 也即是 神 的沟通。这里 和 与 谐 虽然没有直接组成一个词,却表达了 和谐 一词的内涵: 和 就是 谐, 谐 就是 和。当代表地籁的乐器之音、人的咏唱即人籁与来自神的声音即天籁之音交融汇之时,地籁、人籁、天籁也就达到了和谐完美的统一境界,达到了 人神以和 的目的。这样的仪式充满了神圣庄严的气质,其中的音乐,被视作 雅乐。

和 字演绎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比印刷术发展显得更为复杂。在 和 的古体形态里,它是一个象形文字,甲骨文、金文和篆书分别写作 𠄎, 秦统一中国规范文字后,篆体的 和 被简化为左边 口 右边 禾 即 和 汉隶书流行以后, 和 字的写法变为左 禾 右 口,一直传承至今。

和 字的本义最早是音乐上的概念

汉代许慎《说文解字·龠部》中说: 龠, 调也, 从龠, 禾声, 读与和同。并有注释说 经传多假和为龠。也就是说, 和 是 龠 的假借字。而从 龠 的组字结构来看, 龠 的右边 禾 是它的读音,左边的 龠, 则指的是一种笛或排箫之类的乐器。从 龠 的组字符号 人、一、口、口、口、册 来理解, 人 是乐手, 三 口 表示三孔或多孔的笙, 也可以表示多种管乐, 而 册 便是乐谱, 一 代表一个人按照乐谱吹奏三孔的小笙或代表多个人按着乐谱演奏统一的乐曲。《说文解字·口部》中说道: 和, 相应也。这个 相应 的意思就是相互呼应、应和、谐和,无论是一个人吹三孔的笙,还是由八个人分别演奏八种乐器,只有乐音 相应, 才能组合成一支美妙的旋律,这就是 龠, 音乐中后来所说的 和声。在《国语·周语下》中,韦昭注释说: 和, 八音克谐也。《周礼·春官·典同》郑玄注释说: 和, 谓调其故器也。 这里, 都说明了 和 在乐音中所具有的协调、调

美 和 善 联系起来, 乐以和为美, 乐和而后善。孔子 和 的音乐美学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整个封建时代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儒家音乐美学的审美理想基础,并在战国时期由孟子、荀子继承并加以发展。荀子重视音乐的社会功能,强调乐与政通,认为雅、颂之乐和礼义一样,具有使社会免于乱而归于治的作用。

和 字在后来的使用中有了更为丰富的社会学意义

在有记载的史料上, 和 超越音乐的概念最早是由西周末年的太史史伯提出的。在回答郑桓公提出的周朝将要衰微的问题时,史伯提出了 和 实生物 的著名论断: 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 故能丰长而万物归之。若以同裨同, 尽乃弃矣。史伯非常鲜明地指出了只有和谐才是创造事物的原则, 和谐、融合使万物发展, 同一是不能连续不断永远长有的。继史伯之后,春秋晚期的晏婴也对齐侯阐述过 和 的内容。《左传》载其语云: 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 燂之以薪, 宰夫和之, 齐之以味, 济其不及, 以洩其过。君子食之, 以平其心, 声亦如味, 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 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若以水济水, 谁能食之? 若琴瑟之专一, 谁能听之? 同之不可也如是! 晏婴在这里将治国的道理比作美食的调和与音乐的编配。史伯和晏婴所说的 和 已经不仅仅是音和了, 其内涵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既有声音之和, 也有阴阳之和、自然万物之和、君臣上下之和。

孔子的学生有子则提出了 和为贵的思想。有子曰: 礼之用, 和为贵。先王之道, 斯为美, 小大由之。有所不行, 知和而和, 不以礼节之, 亦不可行也。 孔子又进一步丰富了 和 的内涵, 他说: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孔子及其学生所说的 和, 既是一个哲学范畴, 又是一个伦理道德的标准和社会治理的标准。孔子依此把 和为贵 作为儒家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根本指导原则。孔子政治上这种和谐主张, 也就成为其音乐美学思想 和 的理论基础。音乐具有了社会功能, 音乐之和升华到政治之和的层面。

此后, 和 的政治意义更为彰显。统治者的为政之道, 崇尚的便是 政通人和、 内和而外安 等 和谐之道, 对 政和 的追求一直渗透在中国漫长的政治生态当中。

作为谋求 政和 的重要手段, 有一种姻亲关系被冠之以一个非常具有亲和力的名称: 和亲。和亲是封建君主为

了免于战争与边疆异族统治者通婚(前651年-前619年)时期, 襄王欲攻伐郑国, 故娶狄女为王后, 以图谋与戎狄兵联合伐郑。这是历史上较早出现的和亲事件, 此后汉唐直至明清, 和亲之举不绝于书。唐太宗时期, 文成公主远嫁吐蕃, 便是和亲的典范。在她的影响下, 汉藏两族的友谊有了很大的发展。和亲往往是以公主或宗室女下嫁蕃邦国王, 但汉元帝时, 却出了一位出身平民的和亲女子, 她就是王昭君。作为历史上第一位出身平民的和亲女子, 王昭君经历了自请和亲、安居塞外、为国献身等重要的人生选择, 最终成为汉匈两族的和平使者。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昭君出塞的故事一直为后人所缅怀、传颂, 原因就是她们的婚姻在附着了浓厚政治色彩的同时, 又有一种隐逸的曲折浪漫, 统治阶级的大我和女人情感上的小我, 在 和亲 的原则下化为一统, 化为琴瑟和鸣的夫妻亲情, 化作民族融合的和亲之福, 她们的和亲以婚姻形式的小和迎来了国家主权完整的大和, 赢得了民族的空前团结与边疆的平安定。

因为 和 所代表的为政之道,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会以某种形式标志自己追求 政通人和、 内和而外安 的政治理念。清顺治二年(1645年), 就曾通过对皇家建筑的命名来表达对崇尚和谐的政治理想与文化诉求。例如, 将 皇极殿、 中极殿、 华盖殿 分别改为 太和殿、 中和殿、 保和殿, 将 皇极门 改为 太和门, 象征 君臣之和; 将通向文华殿的 会极门 改为 协和门; 将通向武英殿的 归极门 改为 雍和门 (乾隆元年即1736年又改为 熙和门 ), 象征



唐章怀太子墓壁画《礼宾图》

史说新语

### 正确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

我们应该澄清当前流行的一套空洞浅薄乃至荒谬的一切历史叙述。我们应该设法叫我们中国人知道真正的中国史,好让他们由真正的知道,而发生真正的情感。这样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这一个责任,自然要落在史地教育者的身上。

中国文化是世界上绵延最久,扩展最大的文化,只以五千年来不断绵延不断扩展之历史事实,便足证明中国文化优异之价值。近百年来的中国,不幸而走上一段病态的阶段。这本是任何民族文化展演中所难免的一种顿挫。又不幸而中国史上之一段顿挫时期,却正与欧美人的一段极盛时期遭遇而平行。国内一般知识分子,激起爱国忧国的热忱,震惊于西洋势力之咄咄可畏,不免而对于其本国传统文化发生怀疑,乃至轻蔑,而渐及于诅咒。因此种种空洞浅薄乃至荒谬的国史观念,不胫而走,深入人心。然而此种现象,亦依然还是一时的病态,并没有摇动到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底。只看此次全国抗战精神之所表现,便是其明证。试问若非我民族传统文化蕴蓄深厚,我们更用何种力量团结此四万万五千万民众,对此强寇作殊死的抵抗?

当知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所谓民族争存,底里便是一种文化争存。所谓民族力量,底里便是一种文化力量。若使我们空喊一个民族,而不知道做民族生命渊源根底的文化,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目前的抗战,便是我民族文化的潜力依然旺盛的表现。此在一辈知识分子,虽有菲薄民族文化乃至加以唾弃的,而在全国广大民众,则依然沉浸在传统文化的大洪流里,所以宁出于九死一生之途以为保护。

由此言之,今日史地教育更重要的责任,却不在于国史知识之推广与普及,而尤要的则更在于国史知识之提高与加深。易辞言之,不在于对依然知道爱好国家民族的民众作宣传,而在于对近百年知识界一般空洞浅薄乃至荒谬的国史观念作纠偏。更要的,尤在于对全国民众依然覆于斯传统文化,能重新加以一番新认识与新发挥。在此革命建国时代,又值全世界大动荡之际,若非将我民族传统文化作个深的研寻与更高的提倡,而仍是空洞浅薄或仍不免于荒谬地只求利用历史来对民众暂时作一种爱国的宣传,依然一样的无济于事。

节选自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题目为编者所加